

# 上博简《诗论》“邦风”避讳说献疑

钟书林（西安文理学院 讲师）

摘要：上博简楚竹书《诗论》的出土，刷新了以往的《诗经》研究，其中要数马承源先生提出的“邦风”避讳说影响最大。马先生认为，《邦风》才是《诗经》十五《国风》的初名，汉代因为避刘邦讳才改成现名。针对这一说法，文章从研究汉代避讳的实际情况出发，结合出土的汉代文献，对照今本《诗经》，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马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。

关键词：上博简 《诗论》 邦风 避讳

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自整理问世以来，备受学界青睐，成果夥多。但也存在不少争议以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。《诗论》的出土，刷新了以往的《诗经》研究，其中要数马承源先生提出的“邦风”避讳说影响最大。马承源先生在释读《孔子诗论》第三简“邦风示（其）内（纳）勿（物）也”时指出：“《邦风》就是《毛诗》的《国风》，《邦风》是其初名，汉因避刘邦讳而改为《国风》。”<sup>[1]</sup>这一观点为学界广泛采纳，遂成为流行说法。但是，在传世的文献中从没有过“国风”原为“邦风”的说法，不免让人生疑：“国风”真的原来叫做“邦风”吗？汉代的避讳情况到底怎样呢？因而，本文就此略陈浅见。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马先生等时贤的敬意，更不表明我们因此高明。其中或看朱成碧，但亦意在抛砖引

玉，以求其是。

—

汉代的避讳较为宽松自由，与后世的原则大不相同。陈垣先生说：“汉时近古，宜尚自由，不能以后世之例绳之。”<sup>[2]</sup>他又说：“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于诸帝讳，有避有不避。其不避者固有由后人校改，然以现存东汉诸碑例之，则实有不尽避者。大约上书言事，不得触犯庙讳，当为通例。至若临文不讳，诗书不讳，礼有明训。”<sup>[3]</sup>所以，汉代这种避讳的宽松自由，恰恰增加了后世研究的难度。

汉代对于避讳的要求，没有一以贯之地实行过。西汉宣帝元康二年下诏说：“闻古天子之名，难知而易讳也。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，朕甚怜之，其更讳询，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。”可知汉宣帝曾一度

金文集录》“师罋”铭文也隶作“𠂔”，四川辞书出版社，1984年。

[12] 陈秉新：《金文考释四则》，《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（古文字研究专号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456-459页。

[13] 王国维：《说盃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三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152、153页。

[14] 郭沫若：《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》，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》卷六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09页。

[15] 青铜器盃是否有调酒功能，至今尚无直接而坚强的证据，但1980年江苏吴县何山春秋晚期墓所出鏃于铭文

中自名为盃，鏃的用途之一是煮郁金草以和于鬯酒中。那么盃器很可能有调酒的功能。

[16] 张临生：《说盃与匜青铜彝器中的水器》，《故宫季刊》第十七卷一期。指出盃、匜互名是因为两器功能相近。

[17] 器形由盃到匜有个转变期的观点并非我所发明，陈梦家先生在考论函皇父组器物年代时，已经提出此种认识，他认为函皇父组器在盘匜已成为新制之后而犹称“盘盃”，可知在盃到匜的转变初期。见《西周铜器断代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253页。



下令要求过，但并没有严厉地执行。在《隶释》引汉石经残碑中，有避讳的，也有不避的，“可谓建武（东汉光武帝年号）以前，亲尽不讳也”<sup>[4]</sup>。建武以后更似毫无避讳的观念。东汉灵帝时，蔡邕等镌刻熹平石经时“远不避光武讳，近不避桓帝讳”<sup>[5]</sup>，足见当时的情况。

要之，汉代既然存在避讳和不避讳两种情况，却据此认定《诗经》“《邦风》是其初名，汉因避刘邦讳而改为《国风》”的说法就不免武断了。此其一。

其二，汉代有“临文不讳”的自由，不讳“邦”字。

这可以由大量的两汉文献特别是西汉初年的文献得到证实。胡适先生曾在考察《焦氏易林》作者时指出：“用避讳作考证的方法，根本就不能用来考证两汉文献的时代，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无疑地证明两汉文人史家都有‘临文不讳，读书不讳’的自由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有‘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’，《封禅书》有‘五岳皆在天子之邦’。《汉书·韦贤传》有韦贤的谏诗，中有‘实绝我邦’，与荒、商、光、同，协韵；又有《在邹诗》，中有‘于异他邦’，与恭协韵。此皆可证西汉不讳‘邦’字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），何况‘季’字？《史记》又不讳‘盈’字（惠帝名），‘恒’字（文帝名），‘启’字（景帝名）。《汉书》也屡用‘恒’字，‘启’字，‘彻’字（武帝名）。《汉书》不但不讳前汉帝名，并且不避‘秀’字（光武帝名），‘庄’字（明帝名）。王充与班固同时代，《论衡》中屡称‘庄’，‘庄公’，‘楚庄王’，‘庄子义’，是不避明帝讳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也不避后帝讳。”<sup>[6]</sup>今在胡适基础上，检两汉典籍，仍以“邦”为例，不避讳的例子甚夥。试分成几类来考察。

1. 个人文集。例如与刘邦同时代的陆贾《新语》中，多次出现“邦”字。稍后贾谊《新书》中也出现2次，再往后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爵国》：“天子邦圻千里，公侯百里，伯七十里。”刘向《新序·刺奢》：“赵襄子饮酒，五日五夜不废酒，谓侍者曰：‘我诚邦士也，夫饮酒五日五夜矣，而殊不病。’”王充《论衡·须颂》：“汉德明著，莫立邦表之言，故浩广之德未光于世也。”《扬子云

集》：“如其用则实五稼饱邦民。”等等，皆不讳“邦”字。汉末的文集中更多，如《孔北海集》2次，《蔡中郎集》17次。

2. 官方性文书、史书。如《盐铁论》，缘于汉昭帝征集郡国贤良文学之士，讨论治国方略，当时围绕罢盐铁问题展开激烈争论，宣帝时桓宽推衍当时双方的论难之语，集成此书。它虽然是由个人最后完成，但却带有官方色彩。在这类性质的书中，仍不讳“邦”字，它共出现4次。

两汉史书不讳“邦”字。尽管它们属私人著述的形式，但最后都作为国家档案，为官方所器重。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前后出现“邦”字10多次，班固《汉书》20多次，袁康《越绝书》2次，等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也有上奏疏时不避讳的。如《汉书》卷六十四下《贾捐之传》记载他上元帝奏疏时说：“《诗》云：‘蠢尔蛮荆，大邦为雠。’”直接引《小雅·采芣》语，毫不避“邦”字讳。

3. 汉碑。如蔡邕《刘镇南碑》：“穷山幽谷，于是为邦。”不讳“邦”字。宋人洪适《隶释》集录的汉碑中更多，如《隶释·汉竹邑侯相张寿碑》：“缓薄赋，牧邦畿，黎烝殷，四荒饥。”《隶释·汉郎中郑固碑》：“邦后珍玮，以为储举。”等，前后共二三十次。对这一现象，洪适解释说：

汉人作文不避国讳，威宗讳志，顺帝讳保，石经皆临文不易。《樊毅碑》：“命守斯邦。”《刘熊碑》：“来臻我邦。”之类，未尝为高帝讳也。此碑“邦君为两君之好，何必去父母之邦”，《尚书》：“安定厥邦。”皆书“邦”作“国”，疑汉儒所传如此，非独远避此讳也。<sup>[7]</sup>

陈垣先生对此表示认同。他说：“汉时避讳之法亦疏，六朝而后，始渐趋严密耳。马衡曰：‘《开母庙阙》，亦庙名因避讳而改，后人因之，非书碑者避讳改字也。’然则《张迁碑》之‘诗云旧国’亦所据传本如此，非书碑时避讳所改。”<sup>[8]</sup>清人卢文弨也说：“文后忽赘‘诗云旧国，其命惟新’，不晓所谓，汉时风俗固不知有讳忌，类如此。”<sup>[9]</sup>均说明汉人在书写碑文时是不避讳的，只是某些汉儒在传过程中，有避讳的讲究，但这样的讲究为数不多，因为

汉代有“诗书不讳”的明训。

4. 经书注解。汉儒传经不但恪守“诗书不讳”的明训，而且在注解经文时，仍有许多是不讳的。经学大师郑玄注解《周礼》时，不讳“邦”字。例如：

《春官·墓大夫》：“掌凡邦墓之地域，为之图。”郑玄注：“凡邦中之墓地，万民所葬地。”

《秋官·大司寇》：“凡诸侯之狱讼，以邦典定之。”郑玄注：“邦典，六典也。”

《天官·冢宰》：“乃立天官冢宰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治，以佐王均邦国。”郑玄注：“邦治，王所以治邦国也……故《大宰职》曰：掌建邦之六典，以佐王治邦国。”

《天官·大宰》：“以九赋敛财贿……六曰邦都之赋。”郑玄注：“邦都，五百里。”等等。

此外，还有注解《仪礼》时不讳的，如《既夕礼》：“至于邦门。”郑玄注：“邦门，城门也。”

总之，两汉人不但在注解经文时不讳“邦”字，而且在引述《诗经》时也是不讳“邦”字的。下面我们单独来看看。

## 二

其三，汉人有“诗书不讳”的明训，在引《诗》时不讳“邦”字。

这一点远在汉初陆贾《新语》中就有体现。《新语》卷上曰：“故形立而德散，佞用而忠亡。《诗》云：‘或讹尔心，以蓄万邦。’言一心化天下，而（原文缺两字）国治，此之谓也。”引《小雅·节南山》中语。《新语》中有一处值得特别拈出：“故《诗》云：‘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’众邪合党以回人君，邦危民亡，不亦宜乎？”引《诗》中用的是“国”字，但陆贾论述时却反而用“邦”字代替了“国”字。这一情形，足可见对“邦”字的毫不避讳。

《史记·乐书》引《诗》云：“诗曰：王此大邦，克顺克俾。”引《大雅·皇矣》语。今《诗经》文字与此稍有出入：“王此大邦，克顺克比。”《汉书》中引《诗》不讳“邦”字的更多。如《汉书》卷十四《诸侯王表》云：“《诗》载其制曰：‘介人惟藩，大师惟垣。大邦惟屏，大宗惟翰。’”引《大雅·板》语。又卷二十三《刑法志》云：“《诗》

曰：‘仪式刑文王之德，日靖四方。’又曰：‘仪式刑文王，万邦作孚。’”分别引《周颂·我将》、《大雅·文王》语。又卷九十九上《王莽传》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’”引《大雅·瞻印》语。……可谓例证甚夥。

《孔子家语》也多次引《诗》不讳“邦”字。<sup>[10]</sup>如卷五《困誓》云：“孔子曰：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”又卷九《正论解》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’”分别引《大雅·思齐》、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语。此外，还有如刘向《新序》卷七《节士》云：“孔子曰：子为父隐，父为子隐，直在其中矣。《诗》曰：‘彼己之子，邦之司直。’石子之谓也。”引《郑风·羔裘》语。所有这些，都是汉人征引《诗经》而不避讳“邦”字的有力证据。总而言之，认定《诗经》“《邦风》是其初名，汉因避刘邦讳而改为《国风》”的说法，是以今论古、想当然的说法，经不起推敲。这一说法的错误，将在今天出土的大量考古文献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。

其四，今天出土的汉代简帛文书，有许多不避讳的例证。

如果说，上博简《诗论》是战国竹书，竹书中的“邦风”二字到了汉代，因为避讳的原因，改成了“国风”的话，那么，这种观点将在今天出土的大量的汉代简帛文书面前不攻自破。如果说，我们前面引证的大量文献只是后世纸质文献，不免经后人手而窜改，不能作为百分之百的反驳证据的话，那么，新出土的汉代简帛文书的地下文献，足可帮助我们辨证汉代“临文不讳”、“诗书不讳”的事实。因而，既然上博简竹书是地下文献，我们就也用汉代的竹书来作旁证，帮助我们作进一步地论证。

1977年在安徽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阜阳汉简，向世人展现了二千多年前古本《诗经》的真面目。“根据出土器物铭文等材料判断，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婴。夏侯婴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，卒于汉文帝十五年（公元前165年）。因此，该墓出土文物的下限不能晚于这一年。”<sup>[11]</sup>在阜阳汉简《诗经》中，不避“盈”字（惠帝名）。按胡平生、韩自强先生的整理编号，其S097云：“印（殷）其盈矣，



女曰观吾，士曰既且。”<sup>[12]</sup>这是《郑风·溱洧》中的一段文字。它说明在汉代，《诗经》是不避讳的。

2004年，韩自强先生又整理出版了阜阳汉简《周易》，其30号竹简云：“上六大君有命启邦”韩自强作异文比较说：“今本、帛书：上（尚）六，大（人）君有命，开（启）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”他在释读时作按语说：“‘启’字下面仅存右边‘邑’旁。‘邦’字无疑。”后来又下按语说：“阜易‘启邦’，帛易作‘启国’，今本作‘开国’，阜易没有避汉高祖刘邦讳，帛书避刘邦讳，改‘邦’为‘国’，今本又避汉景帝刘启讳，改‘启’为‘开’。”<sup>[13]</sup>又韩先生同书作有《一号木牍〈儒家者言〉章题》一文，其三十号竹简云：“公问万邦子之病。”<sup>[14]</sup>仍没有避“邦”字讳。可见，由阜阳汉简来看，起码在文帝时仍是不讳“邦”、“盈”等字的。帛书《周易》中避景帝“启”字讳正体现着研究汉代避讳时的复杂情况。至于今本《周易》既避“邦”字又避“启”字，却是后人的意改。

张家山汉墓竹简是不避“盈”字讳的典型。它是西汉早期的墓葬。“据墓中所出历谱可知，墓主人去世当在西汉吕后二年（公元前一八六年）或其后不久。”<sup>[15]</sup>这一时间上距汉惠帝不远，但在这批竹书中，“盈”字似乎成为一个使用最为频繁的字眼，不下数十次之多。

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情况也是这样。它的成书年代在汉武帝或稍早的时期，据《银雀山汉墓竹简情况简介》说：“这批竹简有时似避‘邦’讳，有时又不避（《孙膑兵法陈忌问垒》有‘晋邦之将’一语。‘盈’（惠帝名）、‘恒’（文帝名）、‘彻’（武帝名）诸字，竹简常见。”<sup>[16]</sup>整理专家认为“似避‘邦’讳”，其实也只是一种臆测，因为在这批竹简中并不能找出避“邦”讳的证据。相反，却不乏不避“邦”讳的证据，更不乏不避“盈”、“恒”、“彻”诸字的证据。所有这一切，都恰恰说明了汉代不讲究避讳的事实。

### 三

其五，今本《诗经》中“邦”、“国”二字并存，“盈”、“恒”、“彻”等诸字常见，不存在避

讳的痕迹。

按照马承源先生的说法，因为要避刘邦讳，所以将“邦风”改为“国风”，“邦风”才应是古本《诗经》时代的初名。如果沿着马先生的这层思路继续推理，就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：今本《诗经》中不会再有“邦”字。因为既然“邦风”改成“国风”，并沿用至今，那么《诗经》中的所有“邦”字也就应该全部改为“国”字，并沿用至今了。即使有少量的“邦”字出现，那也应是后人回改的结果。<sup>[17]</sup>

很显然，这样的结论与今本《诗经》的真实面貌大相径庭。翻看今本《诗经》，“邦”字等避讳字处处可见。如果将一些代表性的避讳字的出现频率作以统计，就可以得到如下结论：“邦”字在今本《诗经》中，共出现50次；“盈”字18次；“雉”字（吕后名）9次；“恒”字5次；“启”字10次；“彻”字8次；“弗”字（昭帝名）33次；“秀”字（光武帝名）2次。像“雉”字，竟还出现在诗题（《邶风·雄雉》）中，如果按照马承源先生避讳的说法，那是非改不可的。

由统计可以看出，今本《诗经》中不但不避“邦”字，而且出现频率较高。在上面列举的避讳字中，它的出现频率最高。其次数仅次于“国”字，“国”字出现69次。退一步讲，在这50个“邦”字当中，即使有后人回改，也不会太多。

在今本《诗经》中，还有一个令马承源先生等无法解释清楚的现象：“邦”、“国”二字联用。它分为两种情况。一种是“邦国”作为一个合成词同时出现。这在《诗经》先后出现过3次：“邦国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”（《大雅·烝民》）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（《大雅·瞻卬》）“宜大夫庶士，邦国是有。”（《鲁颂·閟宫》）像这种情况，按照“邦”字改为“国”字的说法，显然很难解释。另一种是在一篇之中，“邦”“国”二字前后出现，如《小雅·六月》、《小雅·节南山》、《大雅·文王》、《大雅·大明》等，共出现在9篇中。在这9篇中，即使有后人回改未尽的例子，但像《大雅·嵩高》等诗篇却也是很难解释的。《大雅·嵩高》云：“亶亶申伯，王缙之事。于邑于谢，南国是式。王命召伯，定申伯

之宅。登是南邦，世执其功。王命申伯，式是南邦，因是谢人，以作尔庸。王命召伯，彻申伯土田；王命傅御，迁其私人。王遣申伯，路车乘马。我图尔居，莫如南土。锡尔介圭，以作尔宝。往近王舅，南土是保。”在诗中，“南国”、“南邦”、“南土”换用，正合《诗经》的曲复往返旋律。程俊英、蒋见元先生解释说：“南国，谢邑在周之南，南国指周南一带的诸侯。”“南邦，指谢邑。”<sup>[18]</sup>从他们的解释中可以看出，“南国”所指的地域比“南邦”要大，它包括谢邑在内的周南一带。换句话说，在《诗经》中，尽管“邦”“国”联用，但“邦”所包涵的地域要比“国”小。这可以从文献和字源上得到进一步证实，此处不述。

综而言之，战国楚竹简的问世，是新世纪学术的盛事。陈寅恪先生曾在《敦煌劫余录序》中说：“一时代之学术，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问题，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。”<sup>[19]</sup>足见此次楚竹简的发现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。因此，我们更应该审慎地对待它、研究它。

注释：

- [1] 马承源：《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（一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29、15、16、131页。
- [2] [3][4][5][8] 陈垣：《史讳举例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108、108、2、108、3页。
- [6] 胡适：《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》，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20册上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7页。
- [7] 宋·洪适：《隶释》卷十四《石经论语残碑》，中华

书局，1985年。

- [9] 清·卢文弨著，王文锦点校：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十五《汉荡阴令张迁表颂碑跋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204页。
- [10] 两汉子部典籍中也有许多“临文不讳”，不讳“邦”字的。如相关孔子事迹的典籍孔鲋《孔丛子》及《孔子家语》中都多处不讳“邦”字。《孔子家语》早在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就有记载。但自三国王肃为之作注后，长期被视作伪书。“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了与《孔子家语》内容相似的竹简，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又出土与《孔子家语》有关的简牍。这说明《孔子家语》并非伪书，它的原型早在汉初就已存在。”（廖名春、邹新民校点整理《孔子家语·出版说明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）
- [11] 胡平生、韩自强：《阜阳汉简〈诗经〉研究·前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。
- [12] 胡平生、韩自强：《阜阳汉简〈诗经〉研究·阜阳汉简〈诗经〉初探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71页。
- [13] [14] 韩自强：《阜阳汉简〈周易〉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，第49、105、154页。
- [15]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张家山汉墓竹简·前言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。
- [16]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银雀山汉墓竹简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5页。
- [17] 关于避讳中后人回改的例子，请参看陈垣《史讳举例》卷五第五十一“避讳不尽或后人回改例”、第五十二“避讳经后人回改未尽例”。
- [18] 程俊英、蒋见元：《诗经注析》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，第891页。
- [19] 《历史语言所集刊》第1册第1分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231页。